

南开校史研究 丛书

第十一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书 | AOSH IYANJ I DOONGSHU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

第十一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 第 11 辑 /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
编委会编.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4.3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309-7573-2

①南… II. ①南… III. ①南开中学-校史-研究
IV. ①G639.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7568 号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 第十一辑

出 版 人 胡振泰

本辑主编 吕培天

责任编辑 王剑文

装帧设计 冯 笛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787×1092 毫米)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1

定 价 25.00 元

天津南开校史研究中心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孙海麟

主 任 何荣林

副 主 任 孟宪刚 吕培天 周鸿飞 吕宝桐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嘉珂 王玉茹 王增多 冯 筵

吕培天 吕宝桐 李 晖 何荣林

孟宪刚 杨 洋 周鸿飞 张国发

洪 颖 贺海龙 赵 凯 徐锡玲

本辑主编 吕培天

副 主 编 吕宝桐

编 辑 冯 筵 王增多 徐锡玲

目 录

- 001 深切怀念南开校父严修先生/孙海麟
- 014 罕见的南开中学丁二班班史/周鸿飞
- 025 私立南开中学的“公能”标准/李 群
- 031 读南开中学戊辰毕业同学录/薛 紫
- 037 南开《校风》考/冯 竺
- 042 2013 届高三年级毕业班工作回顾/马跃美
- 051 全国周恩来班、邓颖超班经验交流活动纪实/吕宝桐
- 055 天津南开中学体验创意中心建设始末/李 峰
- 063 天津南开中学“两馆”改建工程纪事/杨乃东
- 070 敬制严修张伯苓周恩来铜像和纪念钟亭纪实/张德林
- 074 “传鉴楼”命名的前前后后/乔慕英 姚 珪
- 077 南开学生为华北实况告全国民众书/冯 竺 于 梅
- 081 追忆南开学校小学部/富文衡
- 087 “国之大医”的南开校友/程新建
- 091 回忆孙养林先生的生物课/刘令仪
- 093 严师慈母左景福老师/康 慈
- 098 深切怀念王荫槐先生/张怡贤

- 101 周恩来中学时期的学校氛围及形成原因/韩文霜
- 105 周恩来中学作文对当代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张 扬
- 113 青年周恩来教育思想的体现/王 蕊
- 118 “民族国家想象”的萌芽/马西超
- 122 为梦想插上翅膀/李忠艳
-
- 126 南开中学艺术教育实践与研究/吕宝桐
- 134 中学德育活动课对学生情商的培养/马丽坤
- 139 课堂因特色而精彩/马 艳
- 145 高效课堂 快乐铸就/李 娜
- 149 践行创新型人才培养/解 英
-
- 154 南开校董(上)/冯 竺
- 156 老不辞劳郑菊如
- 157 学问通家陶孟和
- 158 博学异才卢木斋
- 160 参展世博严智怡
- 162 双鉴楼主傅增湘
- 163 一代富商王益孙
- 165 编后记:历史现实相辉映

深切怀念南开校父严修先生

孙海麟

2013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5周年,也是周恩来入学天津南开中学100周年;2014年是南开中学建校110周年。值此时刻,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怀念南开中学和南开学校的创始人、爱国教育家严修先生。

一、勤奋履职,忠于职守,立志维新,变革教育

严修先生,初字梦扶,又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先世移居天津,1860年出生。严修先生是个接受过完整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前清壬午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授贵州学政,农历九月十六日离京赴贵州上任,路途遥远,一路坎坷。从北京至贵阳,走了两个月零九天。抵省后,即在省会贵阳和各府县考察学政,选拔人才,特别是其在贵州兴办经世学堂和上奏朝廷建议设经济特科尤为后世称道。贵州人杨兆麟曾对陈宝泉(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先生说:“先生任贵州学政,勤勉有加。经世学堂开课,适当学政驻省之时,范公每日到堂听课,无少迟误,虽学子无其勤也。”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清廷政治腐败,外侮日亟。严修忧国忧民,他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于是,他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奏请清廷开设“经济特科”(这里说的“经济”,是指“经国济民”,是治理国家的意思)。这是科举改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严修一生中对教育改革的一大贡献。他在《奏请设经济专科以收实用折》中指出:“奏为时政维新,需才日亟,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呼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呼士气。”他主张打破常规,设立经济专科广收天下俊才。《奏折》包括六方面内容:①新科宜设专名。包括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器制造、工程设计等专门知识。②去取无限额数。③考试仍凭保送。④保送宜严责成。⑤录用无拘资格。⑥赴试宜筹公费。由于朝廷内部腐败顽固,严修设立经济特科奏折被排斥。在改良革新力量推动下,五年后,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始开设特科考试,试题限于政

治、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项。严修这一建议终于部分得到初步实施,并被视为戊戌变法的先声,梁启超称之为“变法之原点”。严修先生贵州学政任上风雨飘摇,任期四载,始得北返。

二、考察教育,推进新学,统筹规划,初见成效

严修先生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学校世人皆知。但严修先生主管直隶省教育事业、主管全国教育事业的业绩,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李鸿章信任和支持下,多年在小站操练新军。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引进西方先进的练兵技战术;通过南运河引进黄河水,修建九宣闸,开挖马厂碱河,组织安徽籍官兵在小站种植水稻,使北洋新军逐步形成了气候。袁世凯还格外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对担任过贵州学政的严修先生的学问、人品格外欣赏。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袁世凯任命严修先生为直隶省学校司(后改学务处)督办。严修先生就任后,马上启程东渡日本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出国教育考察。他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1902年8月10日)从塘沽出发,于十月二十八日(11月27日)返回。回来后写成厚厚的《壬寅东游》日记。为适应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他把考察重点放在普及教育和实际需要方面。他多次到小学听课,参观日本文部省各课、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医大、农大、高工、高商、女校、美术学校、音乐学校、体育学校、聋哑学校、幼稚园、同文书院、庆应义塾等教育机构,访问教育界知名人士。从日本回国后,他联合天津乡绅在东门里文庙东北隅创建私立第一小学,并在仓敖街上开校门出入,以示与文庙的区别。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所实行新式教育的小学校。无论课程设置还是师资选拔,学校管理多借鉴日本,并新开音乐课和美术课。他还会同津门士绅掀起了兴建民办小学的兴学高潮。他又应天津知府要求,废庙兴学,建起官立学校多处,像城隍庙、育德庵和药王庙等均建起新式学堂。

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严修先生赴日本进行第二次教育考察,此次他偕在严馆任教习的张伯苓先生同去。那年严修先生44岁,张伯苓先生28岁。此次考察,了解教育行政甚详,聆听了日本教育家关于教科书编纂法和教员培养考核法的介绍。特别听取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关于教育理论的深刻见解。他说:“教育分三类,曰学术,曰教育,曰教育行政,此次先论第三。”他认为,小学、中学可同时举办,不必候小学毕业再立中学。择年龄之长入中学,中学之课程不过视小学略高。视学最要,教科书最要。总长以下有副之者,略如文部之次官,次官以下又一人辅,有此三人则责任有属而事毕举矣。总长去则次官。总之,如是,则方针不致屡变。严修先生此次出访七月十一日(8月21日)返回,回来后写成《甲辰东游》日记。日记中关于嘉纳治五郎

教育行政见解的详细记载,想必对严修先生回津后立即着手兴办私立中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世凯尝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两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在直隶省学校司督办的任上多有建树。但兴办新学与传统科举从根本上是抵触的,是制度上的碰撞。20世纪初,科举制度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严修同卢靖(木斋)面谒袁世凯。卢靖力陈科举制度的弊端,谓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袁世凯询问严修的意见,严修明确赞同,认为废科举是“兴学根本之途”。袁世凯本非正途出身,对科举亦无所恋,听严修、卢靖力陈,遂电商江、楚总督,同张之洞等一道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光绪皇帝遂下旨“立停科举,以广学堂”。同年八月,清政府宣布翌年起废止科举。自此,从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这其中严修先生疾呼有助臂之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教育部),十一月严修候补三品京堂署学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二年转学部左侍郎)。当时,学部尚书为荣庆,熙英为左侍郎,荣、熙二人不懂教育,熙英又不久病故,所以学部事务实际由严修统筹。这时的学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主持新型教育的中央行政领导机关。严修以两次赴日本考察的心得和在天津及直隶推行各类新教育的经验成果,结合当时全国废除科举、推行新学的特点,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新措施。

1. 首次明确教育宗旨

严修在《奏请颁布教育宗旨折》中提出:“中国政教所固有而亟易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者,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应该说这是切中时弊,抓住了要害。奏折中还说,“今日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人材,而在造就多数国民”。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问题。

2. 开创女学,公布女学章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正式公布《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当时男尊女卑,对女子上学多加责难。两个章程的公布实施,使女学、女子师范教育被正式纳入教育体制,应该说这是极有创见的一件大事。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兴办的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在严修主持制定的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影响下开办的。

3. 推动初级教育、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

在财力短缺、师资困难的情况下,学部努力从现有条件出发,建立和推行初级教育,如设立简易小学堂和改良老式私塾为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学部曾明确:“方今振兴教育,以小学堂为基础,而教员亟于养成,故师范尤要。”除女

子师范外,学部对初级师范、优级师范等都曾制定章程。严修还注意各项社会教育事业,创立图书局,编辑教科书及参考用书;成立名词馆,编定各学科中外名词表;还成立了京师图书馆,推进社会教育。

4. 建立教育视导制度

教育视导制度是教育行政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部奏定官制时明确:“拟设视学官,约十二人以内……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后颁布视学官章程,对各省县级视导人员,也作了相应规定。民国后基本沿用这一制度。光绪三十三年后,学部还对全国教育情况开展了普遍调查。这在长期的封建王朝里也是空前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两宫大丧。严修深感主持全国学务的复杂艰难。宣统元年(1909年),他终于托病辞官归里。严修先生在学部四年,为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制度尽心竭力,精心运筹。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各类学校学制,都有新的气象。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部成立时,全国官立、公立及私立学校共有四千余所。宣统二年(1910年)增加到五万多所。学生人数也从十余万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余万。与此同时,出国留学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严修先生任贵州学政履职四年、直隶学校司督办三年、学部侍郎四年,立志创办新式教育,造就新型人才;首倡设立“经济特科”,“两度东瀛采药归”;着力推进师范教育,着手开办女学,开始规划中国的教育事业,为破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型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创办南开,奠定始基,构筑体系,成就最高

严修先生一生注重事功,著述很少。他中年时曾说:“好争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威,好察者必不智,好服药者必不寿,好著书者必不通。”对世情的练达使他“轻著述而重躬行”,下决心选择“毕竟须回实处去做”的人生道路。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从贵州学政任上返回故里的严修,在自己的宅院设立了学馆,史称严馆。他聘请天津宿儒陶仲明和22岁的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来教授自己的子弟。半日陶仲明老师教经书,半日张伯苓教习英文、数学及理化等科,并将体操引入教习内容。从《严修日记》得知,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始学洋文”。其中8月7日的日记记载:“数日以来,发愤早起,签判之后,便治洋文。”由此严修对英文教学十分重视,他选拔英文基础好的张伯苓来任教绝不是偶然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天津八大家之一“益德王家”的津绅王奎章及其子王益孙(字锡英),热心办学,创办家塾,取名王馆。他们聘请张伯苓同时监理王馆教学。

严修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察完日本教育回津后,在津兴办了中国

第一所新型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严修偕张伯苓第二次考察日本教育,受日本教育的启示颇深,决心在国内兴办新型中学教育。在从日本返国的轮船上,严修经过深思熟虑非常明确地阐明:“要于津城办私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表示“极愿效绵薄之力”。此次考察农历七月十一日返津后,严修立刻为筹建中学堂做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据《严修日记》记载,七月二十二日(9月1日)“晚与伯苓先生商议立中学堂事”。七月二十六日记载:“墨卿来谈,观张伯苓演仪器。”八月二十九日记载:“晚讲习所,听张伯苓讲物理重学。”严修率先垂范,让出自己的私宅偏院英文馆以作中学堂教学之用。两间北房,各两丈长、一丈宽,以作教室。又有一间大房,可容百人,既作礼堂,又作讲大课之用。6位教职员分用三间小房,一监督用,一教职员用,一会计用。房屋修缮费用由严修先生承担,教材器具和文具由王家承担。严、王两家还负担每月一百两白银的经常性费用。后不敷支出,每月经常性费用提高到二百两白银。经过招生考试,七十三名学生被录取,分为三班,学制四年,每月学费三两白银。最初开设的课程,中学课程有读经、国文和历史等,西学课程有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和英文等。张伯苓尤重学生英语能力培养。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九月八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位于天津城西北角的严氏偏院开学了。这标志着以国际先进教育模式为样板、以中华“模范中学堂”为标准的私立中学诞生了。严修先生是学校的出资人和创办人,张伯苓先生为监督。由于清政府对新型学校管理缺乏章法,最初三年学校也三易其名——初创时称私立中学堂,第二年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第三年改为私立天津第一中学堂。由于连年招生,学生拥挤,急需扩建新校舍。天津开明乡绅郑菊如先生闻讯,即慷慨允将南开水闸旁隙地十余亩捐赠给学校。严修立即着手筹集建校资金,他首先拿出自有资金五千两白银;王益孙慨然拿出一万两白银,东三省督军徐世昌拿出一千两白银,卢靖争取到浙商支教资金一万两白银,共计两万六千五百两白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初一动工,建设了东楼、北楼、部分平房和围墙。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初一竣工,学校搬入。实际共花费白银两万三千两。此前,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为学校捐银五千两,学校从结余工程款中又贴补一部分。于光绪三十三年建成了西式平房的礼堂,号“慰亭堂”。自此,一所中西合璧、庄重大气的“模范中学堂”的校舍巍然建立起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学校正式举行了新校舍迁入仪式及校庆三周年纪念活动,私立南开中学堂正式形成。

严修先生不仅自己出资和筹集资金进行构建学校设施等硬件建设,还非常关注学校的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私立南开中

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严修为首届毕业生撰写了《毕业训词》,充分反映了严修办新型中学培养救国人才的教育主张。训词说:“前张伯苓先生来京师言,天津敬业中学第一班学生举行毕业式。鄙人以官守在不获与会,然想象其时主宾咸集,揖让进退,殆仿佛亲其事焉。伯苓先生谆谆以择言相嘱,鄙人辞不获已,聊举本堂历史,以为诸君告。”在简述南开中学创办历史后,训词又说:“今日学额渐增,诸生适于斯时学成毕业,岂惟本堂师弟之光荣,揆诸同人设学之初志,亦可谓无负者矣。事无难易,故立志者,入德之门也。”“诸生素讲习人伦道德一科,即知即行无俟过虑,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则在国民道德。今者,内政外交事变日亟,国势不振身家詎能独存?年长之英雄虽有匡时之志,而无其才;未来之英雄,无论有无其人,而时已不待,今日所赖以转移国势者,舍有志之少年,其又奚属?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其大意是说南开中学因国难而诞生,与民族共命运。其注重“国民道德”,旨在使学生树立“匡时之志”,培养“未来英雄”,寄望诸生“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将来成为“转移国势”的“中国少年一部分也”。严修先生忧国忧民,教育救国的宏愿初衷跃然纸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六日,私立南开中学堂第一班学生33人毕业,学校隆重举行仪式,由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亲授文凭。严修先生也十分欣喜,除发表《毕业训词》外,还为优秀毕业生11人题写了扇面。《严修日记》中载:“回府书扇十九,私中毕业最优十一人,金邦正、卞肇新、梅贻琦、张彭春、张书珊、高兆夔、魏有万、李麟玉、罗凌瀛、喻传鉴、顾寿颐,人各一扇。”

对学生的品德修为,严修自己的人生体验独具特色地制定了南开中学“容止格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四十字“容止格言”匾连同大立镜,一同悬挂在学校东楼的中厅里。当时,学校开东门,学生进东楼,映入学生眼帘的首先是严修先生的至理箴言。这既是他对学生品德修养和精神气质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他对学校办学方针的殷切期待。当时,中外宾客对“容止格言”交口称赞。美国人特地致函索要内容和照片。1916年4月,周恩来在《校风》杂志上发表“函索镜影”纪事一则:

“我校事务室前所悬之大镜及上列格言,原为资警励全校师生之用。前次美人白崔克博士(Dr. Buttrick)来校参观时,睹之甚以为善,今格瑞里先生(Mr. Greene)致函校长,索斯镜之摄影,并请将格言译作英文,同行寄去,以为纪念。藉俟归美时公之彼邦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一位美国朋友来南开中学东楼参观时说:“我在日内瓦会议见到周恩来先生,他的仪容风度令人赞叹,原来他在学校就受严格教育。”“容止格言”是南开中学一宝,它对造就一代又一代内外兼修的南开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据《严修日记》和《严修年谱》记载:“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二十二日,出部回津。”归津之日,“见大嫂、二妹、侄妇、儿妇、侄孙、孙男女兼来见,周视庭院。惺步至南开中学堂,周视各室。九点钟后,同伯苓归,话至十一钟,别之。”是说严修先生学部四载回津当日,渴望见到自己的子嗣,“周视庭院”;渴望看到自己一手创建的私立南开中学堂,“周视各室”,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顷刻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政府成立。1912年根据民国政府的指示,私立南开中学堂改为私立南开学校。学校监督改为校长。从此南开中学成为南开学校,严修为校董,张伯苓为校长。从1912年至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成立大学部止,这期间南开中学就是南开学校,南开学校就是南开中学。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组建大学部,1923年组建女中部,1928年组建小学部,南开学校羽翼渐丰,架构已成。严修先生是南开学校创始人,也是南开学校四部、四校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学校校长,是男中、大学、女中及小学校长。对南开中学而言,严修先生永远都是创始人。张伯苓先生从1904年10月至1951年2月去世为止,终生都是校长。对于南开学校而言,南开中学是其发源地,是学校的“长子”,是整个学校发展的根基。

把南开中学办成中国“模范中学”是严修先生的办学目标,也是他多年规划领导的努力方向。他志存高远,抱负宏大。1911年清华学校成立,他委派和推荐张伯苓去担任教务长。因兼职京津两地奔波,半年后就不再担任了。1923年至1925年他又委派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字仲述)去担任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招生)教务长。由此可见严修先生的苦心。他不仅委派得力人员去实地实践管理大学的做法体会,他还亲自去教育先进国家考察。1918年10月他偕张伯苓第三次到日本考察教育,并随后到美国深入考察教育四个月。在美国考察期间,张伯苓每日去大学听讲两次,晚上为严修先生讲大意。先生也常至大学听讲教育课。从海外考察归国后,严修先生即牵头抓紧研究方案,募集资金筹建大学。《严修日记》载:“1919年2月4日,往南开学校,与伯苓、仲述、午晴、千里议筹备大学事宜。”“2月8日同伯苓往香厂赴陶孟和六味斋之约,同坐蔡子民(即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等。”所议当然又是办

大学事。筹建大学除了建校方案、校长人选、师资队伍以及管理体制之外,关键是建校资金和办学经费。严修先生除了倾尽自己家产之外,还调用了自己一生积累的人脉资源,京津两地和江浙湖广都留下他和张伯苓的“折节劝募”声。功夫不负有心人,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在南开学校南院隆重开学,设文、理、商三科,主教学楼称南楼。1922年在八里台购得土地700亩,随即精心规划、精心施工;1923年,一个高质量、高标准的南开大学全面建成,大学搬入新校区。南楼被南开中学规划为高中楼。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南开中学前身建校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垮台,严修先生先后为南开中学建校办学捐献三万两千两白银。从1904年办私立中学,到办南开学校大学部、女中部和小学部,及至1929年辞世,共25年期间,严修先生倾其家业办教育,先后捐献土地、现金、财物、设施以及图书等折合现金约近百万元之巨。据有人统计,严修先生偕张伯苓先生上下四处劝募,为兴办南开学校(主要是大学)募得资金约有一百八十万元左右。严修先生为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学校立下丰功伟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有不少是国家栋梁之才。这是严修先生终其一生从事教育的最高成就。

四、凛然正气,高尚节操,精诚合作,奖励后学

严修先生去世时,多年的挚友、北师大连任九年校长的陈宝泉先生述事略:“先生为人,外宽厚而内精明,事变之来,每每触机于先,故数当危疑之局,而未与于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冒险上奏朝廷,请立“经济特科”,成为变法之“原点”,受到了自己恩师和顶头上司的打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年幼的宣统皇帝即位,载沣为摄政王,他罢免了袁世凯。严修先生时任学部左侍郎,十分惋惜袁的才干,上疏请留袁氏的外事尚书任,不被理会。袁氏离京时,人们都怕摊上事,独严修先生、杨度先生往车站送别,不以易政而改变多年情谊。公元1912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严修先生潜心办学,多次坚决谢绝袁的“度支大臣”、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的委任和聘请,从始至终没再入朝为官。严修先生认为袁可担任民国总理,但不具担任总统的才气与人品。他坚决反对袁氏称帝。但当袁世凯去世时,他又去“送别”。《严修日记》载,1916年“6月6日,袁总统实于本日十钟一刻去世。十一点抵京,哭项城于居仁堂,犹未殓也。公子十二人环跪号泣,惨不忍睹。即夕返津”。严修先生正气凛然,有情有义。

严修先生创办南开中学和南开学校,成就一生教育事业的最大成就,严修先生对张伯苓先生的信任、指导和同他的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严修先生1860年生人,张伯苓先生1876年生人;1898年,严修办家馆时38岁,张伯苓先生22岁。严修先生立志办新型教育,张伯苓先生在严复先生主政的北洋水

师学堂接触了新教育与新体育,英文流利。1900年八国联军从塘沽的北塘、大沽口登陆,联合天津租界的驻军,击退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攻占天津,占领北京。之后,拆毁天津城墙,军事占领天津两年。其时,占领军的指挥机构叫都统衙门,曾让张伯苓去当翻译,收入高、地位高,但被张伯苓拒绝。严修先生认为,“张君系具有教育毅力者”。对学校的管理,严修先生给予张伯苓先生较大的空间,充分信任,大胆使用。1907年和1908年张伯苓多次提出中国要派奥运选手,要派代表队,要有朝一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这就是有名的“奥运三问”。张伯苓还在学校倡导排演新剧,带头编了话剧《用非所学》。之后,涌现出张彭春、周恩来、老舍(又名舒庆春、舒舍予)、曹禺(原名万家宝)以及黄宗江等一批话剧人才。张伯苓曾对严修说:“学校宜有适当高尚的活动。”严修对朋友说:“此论高我一筹。”1903年元月3日,在严修寓所,张伯苓为严修开讲英文文法,共讲两年。1910年严修辞官回津后,张伯苓又到严宅为严先生讲授英文,每周讲一至两次,每次一至两小时,持续两年之久。严修先生还亲身实践,积极参加南开中学的文艺体育活动。《严修年谱》记载,1910年6月12日由私立南开中学堂主办的天津学界首次联合音乐会在李公祠上演。严修主持,张伯苓演讲,节目有七弦琴、风琴以及笛、笙、箫等乐器演奏和独唱,到场观众有二千余人。1910年10月10日,南开中学6周年校庆,上午纪念会,下午由学生演严修编写的新剧《箴膏起废》。1910年12月17日,严修观看踢球比赛。1911年10月11日,严修在法政讲习所,听《行政法》和《国际公法》讲演。《严修日记》载:“1914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10周年纪念日。余往观礼,10钟开会,校长演说,教员邓君演说,甲班学生周寿年、乙班学生某、毕业旧学生梅贻琦相继演说。十二钟闭会,将于中庭照像。余归家午饭。饭后,往东室讲所听黄任之演说,约两三小时,多中时弊。晚饭后,赴南开中学观剧,剧名《恩怨缘》,凡八幕,可歌可泣,入理入情,虽西洋剧本,亦未能远过也,一钟半乃归。”《严修日记》又载:“1914年12月23日,南开中学举行甲一班、甲二班毕业式。余为发文凭奖品,校长演说,旧毕业生梅月涵(梅贻琦)演说。晚毕业生设酒食,请新毕业生和教职员作陪,余亦预焉。饭后举行庆祝会,代表黄春谷述开会词,校长说笑话,某生说相声,童子会数人演戏,教员数人演戏。”《严修日记》还载,“1915年2月1日在京,同伯苓往清华学校参观”,“2月2日,在京参观北京大学”,“2月3日,在京,同伯苓往汇文大学参观,午后到公立第二中学参观,到协和女学参观”,等等。在兴办南开中学、南开学校的合作办学过程中,对自己所认为的张伯苓先生的不妥行为,严修先生也循循善诱地予以规劝、指导和帮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南开中学的办学、对张伯苓先生的工作都给予了很多实际的支持和帮助;但在接触中,该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加强了对张伯苓信仰

的影响和渗透。终于有一天,张伯苓猛然下了决心——皈依基督教,做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同时也下决心脱离世俗,不再担任学校校长。严修先生认为人才难得,宗教信仰可以自由选择,但既要渡己,更要渡众人。经过严先生和周边朋友的规劝,张先生重新回到校长的岗位。由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不满,学校多次出现学潮。学校多次开除、除名了一些学生。张伯苓也曾因学潮而辞去校长职务。严修先生多次出面劝勉和挽留,学校的办学于是得以有惊无险地正常运转下来。

从校董严修先生和南开学校学生周恩来的关系,也可看出严先生奖励后学、精心育人、英雄肝胆和刚正豪爽的人品。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城内驸马巷,祖籍浙江绍兴。父周贻能,又名劭纲,字懋臣。生母万冬儿;嗣母陈氏,乡里称陈三姑。兄弟三人,恩来排行兄长。9岁时,生母去世,10岁时嗣母去世,生活艰难。12岁时前往东北,随四伯父周贻赓(字曼青)生活。先在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又到奉天(沈阳)城关模范两等小学读书两年。上课回答老师问题时,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1913年2月,周贻赓调到天津任长芦盐务司榷运科科长,与数代均为盐商的严家有了往来。随后,周恩来于1913年4月至天津,先补习英语和数学,当年8月19日于南开学校报到入学,被编到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就读。从这时至1917年6月毕业,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度过了整整四年的学习生活,与校董严修先生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1914年9月,二年级的学生周恩来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创办“敬业乐群会”,周任智育部长并主编《敬业》杂志。9月29日,周造访严宅,求写杂志封面。《严修日记》载:“周恩来来,求写《敬业》杂志封面。周去即书之。”《严修年谱》载:“乙卯六月(1915年7月),严范孙为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题‘含英咀华’四字,作为丁二班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荣获第一名的奖状。”《严修日记》又载:“1916年2月4日,晚往南开观排演《仇大娘》天然剧。”在剧中,黄春谷饰魏名,张瑞峰饰范公子,马千里饰姜氏,周恩来饰慧娘,吴国桢饰仇禄。据《严修年谱》记载,1917年6月,严修先生创办南开中学13周年,正值第十次毕业生离校之时。据学校《毕业证书存根》:“中学部周恩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校长张寿春。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给。”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参加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他参与编写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并撰写序言。其中对严修先生创办南开之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赴日本。行前写诗一首抒发情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还记载：“1918年7月28日回国探亲，期间8月7日回南开中学母校探望。”1918年10月，严修先生偕张伯苓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考察时，周恩来多次陪严修先生参观游览考察，先生临行前还同同学一起送行。严氏家庭是个大家族，对每个新成员严先生都精挑细选，眼光独到。对首届毕业生的杰出校友卞肇新，将其招为女婿；金邦正招为侄女婿。对周恩来的才学和人品，严修先生格外欣赏和器重。他通过自己的大儿子说项，希望周和自己的小女儿永结秦晋之好。周恩来考虑严家是名门望族，自己是一介穷书生，于是婉拒了。但严先生对周恩来依旧看重并给予关爱。1919年4月，周恩来自日本回国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斗争，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20人（男女各10人）在东南角草厂庵41号组建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10个男生中，有南开中学的学生和校友7人，他们是周恩来、马骏、赵光宸、薛卓东、潘世纶、胡维宪、李震瀛；女生则有刘清扬、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周恩来主编《觉悟》杂志。1920年1月29日，在领导学生请愿中，周恩来与于方舟、郭隆真和张若茗被武装军警逮捕，并被关押到7月17日。他的出狱得到北平《晨报》董事、著名律师刘崇佑的帮助（无偿为他们辩护）。周恩来后来说，刘是难得的好人。据记载，羁押期间，学生周恩来、马骏，教员马千里、时子周曾受到了学校不公正的对待。近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重新思考很多问题，更加认清严酷的现实。后来周恩来在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面对失学、无业的周恩来，严修伸出了援手，他拿出自己七千元的资金设立“范孙奖学金”，经校董会讨论，决定资助周恩来和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字新慧）去欧洲勤工俭学。资助共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从无延误。行前，周恩来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他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补贴旅欧期间生活。1920年10月18日，周恩来离开天津；11月7日从上海登上“波尔多号”前往法国马赛，从此踏上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后来，1946年9月，他在与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说：“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